

“悠悠”，是张曰凯长篇小说《悠悠玄庄》的基本叙事基调。写一个家族，一座村落的历史，这一题材并不少见。正因为这样，所以新作品所面对的突破难度也就愈大。因此拿到作品，心里第一反应就是质疑——鲁西北，从20世纪初写到20世纪中叶，应该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一个陵谷之变的时代，那么，作家会不会写成“宏大叙事”？读罢，我明白了“悠悠”的含义。这是一本由小及大的书，一本见微知著的书，作家找到了绵密细腻的、从容不迫的叙事，以细节的精到和准确，为我们展示了旧中国农耕文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一个大时代中崩解的进程。这一崩解进程，被写得如此绵密和细腻，借用古人的一句话：“言其小乎？或曰大言皇皇亦可。”

作为小说，再宏大的题材所面临的，也是丰富的、具体的、生动的叙事要求。正如作者在本书的“跋”中所说，细节，是他找到的法宝，欲以弥补他“才情”的“不足”。作者在“才情”方面的自谦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悠悠地、从容地、细密地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村庄的时代故事、一个家庭的人物遭遇，呈现了一个作品独特的美学追求。不难看

# 在绵密与细腻的后面

□陈建功

出，在处理宏观和微观、社会和家庭、时代和个人等关系上，作家更注重后者，甚至还有将“微观”、“家庭”和“个人”推向极至的自觉。于是才有了更为细致入微、趣味横生的艺术情致。但作家并没有把作品推向与世隔绝，作品非但没有在大时代面前逃避，渐渐地，带领我们看到了这一淳朴的村庄和厚德尚礼的家庭所面对的严峻，也看到了主人公面对新时代新生活作出人生抉择的艰难——张宗昌的征粮与红枪会的反抗；北伐军兴起与赵安禄的投奔；宝雁裹脚与妇女解放的学潮……再往后，是抗战中可歌可泣的牺牲，是解放区天晴日朗的新生活与“礼崩乐坏”的叹息……作家由细部发端，却绝不刻意淡化或回避时代。我从这部作品中，既看到了传统中国小说的借鉴与生发，也看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前进。

# 眷念与惋叹纠结的乡土之恋

□王巨才

比，有其独到之处。

正是基于对地域风俗、乡土文化的谙熟和深入思考，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也能匠心独运，别出机杼，在深情诉说人物命运遭际的同时，着力探究、把握他们的文化心理、文化人格。作品写到他们对土地的感怀，对神明的敬畏、对祖宗的追念、对礼法的恪守、对天灾人祸的抗争与无奈、对幸福生活的希冀与惆怅，通过这些，揭示儒家文化在人们心理上和人格上的熏染积淀。小说中的赵太世，是作者着笔最多、用力最勤的人物，他正直善良，急公好义，凭借自己的精明强干和勤劳节俭，料理着一个融洽和睦之家，过着殷实自足的日子。但在这个家庭里，又是等级森严的，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不容僭越。吃饭时，“浅子里放着白馍馍，一碗豆腐熬白菜，这是男人们的饭食；另一个浅子里是棒子面贴饼子，一小碟萝卜咸菜拌了香油，这是女人们的饭食”。“当家的人不入座吃饭，别人也不敢动筷”。“洗脸也是有规矩的，因为一盆热水全家人洗，第一个优先洗的自然是家长赵太世，往后的依次是赵家的男人、赵家的女人长辈、赵家的女人晚辈”。耐人寻味的是，对这些带有歧视性的规矩，全家人都觉得天经地义，顺理成章，毫无怨气。这样的家庭，在旧中国带有普遍性，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很难用好坏、对错作简单评置。作品真实地再现这样的家庭氛围，引发读者思考，是有典型意义的。我们还看到，赵太世是忠厚仁义的，有时又很不近情理，他在长工去世后收养了孤苦无依的宝雁，视如己出，而当得知“安禄家”的有不轨行为时，却不能分说地将这个长期“守活寡”、平时也还算勤快孝敬的二儿媳逐出家门；大儿子赵安福因积劳成病病瘫在炕，他忧心如焚，但当“安福家里的”要他伸出手扶安福如厕时，他把烟袋锅往桌上一搁，决然地说：“我不能倒行孝”，以至于导致安福的死亡。至此，一个在儒家思想文化精华与糟粕交互影响下的农村家长形象便活现在我们面前，他

既古道热肠，又冷酷固执，既精明练达，又惑于愚昧，是复杂的，因而是丰满的、真实的。这个典型的成功塑造，寄寓着作家的人文关怀，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是《悠悠玄庄》颇为精彩的得意之笔。

据我所知，曰凯对中国古典文学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爱好，特别对《红楼梦》《金瓶梅》等名著情有独钟，作过较深入的研究，写过不少心得体会文章。这种汲取于璀璨文学矿藏的艺术营养，奔流腕下，必然投注在他的长篇写作中，使作品呈现出不俗的格调和品位。当我们读到那些关于乡间民俗、市井风情的精心描绘时，常常会想到唐宋以来的一些话本小说。当读到鲁家做打醮法事时“那打醮的小道士将一只铜锣飞到顶棚，又用另一只铜锣稳稳接住，溜溜直转，两只铜锣在他手里犹如两顶草帽耍来要去，博得庄稼人一声声喝彩”时，会想到《老残游记》里白姐、黑妞出神入化的表演。读到宝成在庙会上的走失，宝成宝雁乍一见而眼睛一亮似曾相识的惊喜，两人平目耳鬓厮磨两小无猜，心心相印又每生怨望的情态，以及宝雁去世后宝成在成亲的日子里独自到野外凭吊故人等情节时，更会想到《红楼梦》的有关章节。这中间自然有模仿的成分，但模仿而能得其神韵，能书写到位，没有相当的功力，又岂是容易办得到的。至于张曰凯在遣词炼句方面的用心精当，只想列举一例：

这一天，戏台上早挂出戏牌上演梆子戏《蝴蝶杯》，坤角新秀石榴红主演。台下看棚早已挤满了人。一通锣鼓敲过，石榴红扮演的小旦渔家女胡凤莲一声梆子尖板：

江湖上浪滔滔父女相伴——

台下“嗷”的一声，满棚喝彩！那渔家女挑开门帘，一身素装，头戴斗笠，两手摇橹，在急急风锣鼓点中，迈开云步，如浮云游动，水上漂流，荡到台前。

接着，一个鹞子翻身，扬袖、亮相，又一声喝彩！石榴红沉稳一会儿，一双眸子扫过黑压压的人群，边轻轻摇橹边唱梆

音。从庙会到打醮，从缠足到旗袍，从艳曲到民谣，乃至婚帖往来的行文……中国乡村万象，都进入了作家的民俗长卷。《悠悠玄庄》中更把民俗与农事熔为一炉，不仅注重了民俗事象的描写，而且更有鲁西北农事细致入微的描述。无论是春播秋收、看青守夜，还是贩菜运粮、节令社火……都写得绘声绘色，洋溢着浓郁的劳动气息。其中最为见功夫的，是这些民俗农事的描写，以生动的人物心理和人物行动贯穿其中，读起来越发兴味盎然。比如鲁家三个姑奶奶回家看打醮，姐妹三人的心思、处境穿插于打醮前后，热闹而细腻。又比如赵安禄夫妇以“守护香椿”为名、营造“二人天地”的心计。赵安禄争强好胜，为了不被爹爹小看，播种时耍小聪明，反弄巧成拙的窘态；兄弟二人进城卖香椿的过程，也写得细致入微、生动有趣。我以为，不少细节堪称经典，即使节选置之当代文学教科书里，也是毫不逊色的。

当然，如果说还有哪一点可以挑剔的话，我以为作品对传统小说手法的继承固然必要且成绩可喜，但个别地方印记过于明显，这是应该改进的。



予慢板……

显然，像这样惟妙惟肖、灵动传神的文字，没有对事物的悉心观察，不下一番苦心锤炼的功夫，是写不出来的。如果稍加留意，还会发现，曰凯描写小说人物在不同情境下伤心流泪的情感时，所选择的语言都是不同的，仅我注意到的，就有“汪了泪”“噙着泪”“落泪”“掉落”“抹泪”“擦泪”“滚出来”“滴下来”“流下来”等等的区别，行文的严谨、考究于此可见。

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加以征引，是有感于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渐遭冷遇的当下，曰凯的这部小说，让我们重新体会到文学创作中中国特色民族风格的魅力，进而相信，立足于我们自己脚下的土地，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吸收外来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积极进取，仍是我们的文学健康繁荣，赢得读者的正确途径。

张曰凯同志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悠悠玄庄》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用古典小说的某些语言和笔法去描写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主要写赵太世一家农民家族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命运，从中折射出社会的矛盾、民族的厄难、历史的变革。小说以丰富的细节描写见长，举凡春种秋收等农事生产、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求神礼佛等宗教迷信、使枪弄棒等武术传统，无不被一一细致地写来，给人们展示了鲁西北农村色彩斑斓的民俗风情画。而作家笔下的种种人物，如受过儒家传统教育、恪守礼教的老农赵太世所表现的农村长者的固执和仁厚；他的大儿子——精明农活、安于本分的赵安福的憨直和勤劳；二儿子赵安禄不安本分而从军抗日所表现的勇敢和刚烈；受到新学教育、宁违祖训而不守婚约的孙子宝成所表现的痛苦和叛逆；以及太媳妇郑氏对丈夫如影随形的附从；安福媳妇逆来顺受的坚忍；安禄媳妇红杏出墙的野性和勇于改过的转变；宝成媳妇菊儿（高立英）在不幸婚姻中所表现的苦恼和贤惠；心高气傲却命比纸薄的石榴红受辱复仇，参加抗日和突破无奈家庭的执着和勇敢；吹唢呐的外号“哇儿哇儿”的赵太和为救弱女一把火烧了财主宅院，在日本鬼子面前表现出的侠义和义胆；还有敢于大战军阀和日本侵略者的红枪会首领、为人仗义的赵太魁；乡村教书先生、真心为村民着想的地下共产党员周玉熙等，个个写来都相当真实生动，给读者留下颇深的印象。他们的形象构成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的人物浮世绘，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那时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这是作者历经五年着力经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既是我国新文学反映农村生活的有风格的一部长篇历史画卷，也是一部主题积极、富于思想文化内涵和独特艺术韵味的比较厚重的作品。

小说通过描写封建礼教统治下产生的许多悲剧，表现出犀利的人文精神的批判意识。在小说的描写中，正是由于赵太世固执于封建礼教和迷信，才产生孙宝成与菊儿不幸的包办婚姻，并拆散宝成与赵家养女宝雁两人之间两小无猜的爱情，使宝雁悒悒染病，终于导致她“黛玉式”的死亡。安福媳妇三姐妹中，桃儿被立碑而守活寡，不敢与爱她的赵太和来往；石榴红在霸占她的马德昌死后仍受儿子反对而不能嫁给她与她两心相印的常巴虎，她们的人生全都深受封建礼教观念之害。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深切同情中正闪耀着反封建的人道主义的光彩。当然，小说还张扬了民族优秀的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儒家的仁爱传统在赵太世和赵太魁身上都得到突出的体现。玄庄人民群众在赵安禄、赵太魁、周玉熙领导下奋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更表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其慷慨壮烈，表现得非常感人！赵太世一家人的勤劳，玄庄人抗击匪徒和日军的勇敢，更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质。这都使小说超越农村题材而获得广阔积极的思想意义，也使小说获得更丰厚的文化内涵，将真与善，通过美的形式，有力地传达给读者。小说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自然是作者独出匠心、精致经营的结果。因为新文学产生以来，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数不胜数，张曰凯选取自己最熟悉的故乡生活，并罕有地选取一个中农家族作为自己描写的中心，兼以许多民歌的穿插去丰富自己的叙述，突出了作品以鲁西方言为主调的乡土特色和艺术韵味，从而产生有异于别的作品的独特性和审美魅力。在某种意义上，独特性正是艺术创造精神所必须追求的主体选择。

如果说，作品还有缺陷和不足，我以为，语言方面虽有特色，但部分语言受《红楼梦》等的影响，略显陈旧；人物形象方面，地下共产党员周玉熙的形象刻画稍显薄弱，性格欠丰满和突出；菊儿曾从拐子那里救过小宝成，嫁入赵家且美丽贤惠，因而宝成毫无内心矛盾地与她离婚的心理根据就显得不够充分，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故事情节方面在前半部似乎推进过慢，真是节奏悠悠，缺乏更抓人读下去的悬念，使读者略有沉闷之感。当然，瑕不掩瑜，整体而论，小说还是相当成功的。作者以32万字的篇幅，再现了半个世纪农村的巨大变化，实属非常不易。张曰凯是我大学时代的学友，对他的努力和成功，特别是年过七旬后他还能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创作出这样一部好作品，我感到分外高兴。除了向他表示祝贺，还希望他老骥伏枥，继续写出新的作品来。

# 现实主义的独特艺术创造

□张炯

需要「用心」去读的「武侠小说」  
——评徐皓峰《大日坛城》

□杨葵

徐皓峰近年出了四本书，《逝去的武林》《国术馆》《道士下山》，以及《大日坛城》。按常规体裁划分，第一本算口述实录，后三本是长篇小说。其实我读着，四本书都是不好的，口述实录也好，长篇小说也罢，都是徐皓峰选择的外包装，他已超越体裁之分。

另外，这四本书单看哪本，都挺精彩，但联起来读，更使各自增色不少。倒好像一部书的不同分册，第一本是篇长长的引子，后三本是上、中、下部。这部大书的主题，是武学、见地与修道。有兴趣探究者，不妨照我说的再去重读，定有意外收获。

《大日坛城》的外衣，是武侠小说。在武林“江湖”氛围中，写围棋，写功夫，甚至写到唐密。尽管其中妙句迭出，但作为武侠小说，却不够好看。或者说，前半本还好，后半本节奏拖沓、人物混乱，情节进展线索模糊。

我读《大日坛城》过程中，开始为此大惑不解，因为凭作者之前显示出来的故事架构能力和语言文字的水平，应该不至如此。困惑一来，可能有两种情况，要么弃置一边不再往下读；要么心头一紧，坐端直了，收拾散乱之心，打起十二分精神继续往下读。我之前读徐书时对他心生钦佩，故选择了后者。这一来，不仅又读进去了，且读出更美之处。

还是那个话，武侠小说不过是外包装，“引君入瓮”之后，作者可不想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武术之后有武学，棋术之后有棋道，所谓见不离修，修不离见，仅停留在术的层面不地道，会像个瘸子站不稳。而道之一层，显然不是想写清楚明白，就能清楚明白的，作者也在探究呢。有志者如果于此处挺得住，不妨随他一起探进去——用心探进去，就会发现，人物混乱自有道理，节奏拖沓自有道理，线索模糊自有道理。其

中的奥妙不是一言两语可以概括，我只能说，远比那些面上的打打杀杀油腻、激烈、好看得多。

作者曾在“大引子”《逝去的武林》里，引述李仲轩老人讲如何修炼形意拳，“练拳要学瞎子走路，身子前后都提着小心，从头到脚都有反应”；还说，“意不是想出来的东西，而是得来的东西，一刻意就没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了一点”；还说，“意是先于形象，先于想象的，如下雨前，迎风而来的一点潮气，似有非有”……这些话，都是在讲用心。虽然真正做到这些很难，但比照如此用心，再去读《大日坛城》里棋手的棋、武林中人的功夫，才算入了点门。

比如，书里写到一男一女两个武林绝顶高手，日夜形影相随，可其实二人的关系，是一人公开宣称必杀对方，双方明确约定，除了睡觉、吃饭、洗浴时不得出手，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成为其中一人的瞑目之刻。这不正是“瞎子走路”？

这么说来，《大日坛城》是一本需要“用心”去读，才可体会其不同凡响的“武侠小说”。

由此又想到，时下这样用心去写需要用心去读的小说，几近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长篇小说，无非三五个人物、一两桩小恋情、三五场小风波，哗啦哗啦也似的就翻完了，全然不必细细琢磨。很像时下电脑的所见即所得的傻瓜操作系统，简单快捷，不必记忆，不必思考。

反过来，想想我们曾经的阅读吧，比如《约翰·克里斯朵夫》《安娜·卡列尼娜》，以今天的阅读习惯衡量，也是人物众多混乱，节奏拖沓，情节进展线索繁复。曾经的我们，在这样的小说里琢磨徜徉，用心体会，结果领略到小说的美不胜收。而现在，我们离这样小说阅读越来越远。



《大日坛城》的好看，有王家卫作推荐语：“《大日坛城》有七十二妖魔、三十六佛陀，读之一味听其牵引，脱身不得。”邹静之为之作序，说：“皓峰的书都有好故事，好人物；他的文字指着月亮。”“他深入的思索和飞扬的梦想，一再地让我想到了‘光年’这个词——那感觉像身后有一个辽阔的光年让你想投入进去再不出来……”这绝非虚言，都是切身感受。

《大日坛城》作者徐皓峰近年来在武术界、武侠小说界声名鹊起，此前出版的《逝去的武林》《道士下山》等，已为他赢得极好声誉和大批忠实读者。

作为一位深通拳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广博知识和独到体会的作家，徐皓峰的武侠小说写作，

上接民国武侠小说开山鼻祖向恺然一脉，对武术技术的描摹更加专业；同时另开新局，将武术功夫与各门类传统文化融为一体，融会贯通，以求其“道”彰显，使小说既好看又耐看，留有深长余韵。

“大日坛城”是一幅描绘佛教经典《大日经》诸佛境界的唐代绢画，佛教“唐密”修行者的法物。“唐密”即唐朝时由北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密法，当时日本僧人空海从大唐学得带回日本，流传千年至今。而在中国，“唐密”在禅宗兴盛之后渐渐失传，今人多已不知，说到密宗，只知有“藏密”了。

本书以《大日坛城》为题，故事主线却是围棋。主人公俞上泉是一位围棋天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期间，以其神奇不可匹敌的棋艺，打败日本诸多围棋高手，赢得“第一人”称号。其后又在一次次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与当时中国国内节节败退的抗战形势形成鲜明对照。反过来，当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节节胜利之时，他们视为“国技”的围棋之战却接连不断地败在一个中国人手下。围绕俞上泉，有一意保他和灭他的各种力量在拼争、厮杀；身怀绝技的中国武术高手、日本武士名流、中统特务、日本特务、抗日战士、汉奸……各种力量的拼杀往往如平地惊雷，诡谲迅疾，摄人心魄。身处风暴中

的俞上泉，对各种力量视若无睹，对一切危险置若罔闻，无论是棋盘上的杀气和暗处来路不明的杀气，他均以向死之心面对，而每一次绝处逢生。但他最终却抗拒不了历史车轮的残酷碾压……

除了结局，这个人物让人想起围棋大师吴清源，作者的确借用了吴清源的诸多经历，并写出自己对一个身处浊世乱世的天才的理解。但作者立意不只是在写一个伟大棋手的命运，而是试图在一切人物和故事之上，让某种真理浮现。这就是求“道”。

武术、围棋、唐密，是书中三大要素，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每当俞上泉棋战不利，欲求突破之策时，能够支招打破僵局的常常是武术的功夫高手，而俞上泉的心领神会，融会贯通，揭示出一个真理：无论何种技艺，在高妙之处，在终极的“道”上，都是相通的。

围棋与唐密有何关系？书中一个人物说：“唐密的大日坛城分十二宫，围棋的棋盘也是十二块区域。大日坛城的中央是八瓣红莲，棋盘中央叫天元。只不过大日坛城是由八瓣红莲向四周扩展，而下棋是从边角逐渐向中央进发，进程相反。”围棋棋盘与大日坛城原有形似之处，当俞上泉创造了“直取天元”、由中央出发的新下法而取胜以后，二者就有了

神似。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围棋即唐密。

武术是功夫，围棋也是一种功夫；围棋即唐密，武术的最高境界也是唐密：三位一体。这就是以“大日坛城”做书名的原意吧。虚实结合是小说一大特色。不仅许多人物各有真实历史人物的原型，不仅围棋的棋局皆有出处，唐密的真言和灌顶仪式都是真的，小说涉及的任一技艺：拳术、刀术、剑术、箭术、茶道、花道……其描述都有极可靠的专业性。而这一切“实”，都融化在虚构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中，相映生辉。结实的技术与超拔的想象力相结合，使作品质地厚重而又气息灵动，令阅读者有了获取知识、启发思维、激发灵性的多重享受。

整个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层层跟进，环环相扣，令人读之欲罢不能。

《大日坛城》不是一部单纯的武侠小说和传奇文学，它写武术，写棋艺，写杀戮，写侠气，写情义，但不止于所写；它有好故事好人物，也不止于好故事好人物。有禅密佛学修养的读者，或许对它更能心领神会。它内容和内涵的丰富，让人难以简单道出，就像邹静之在序中说的，“那感觉像身后有一个辽阔的光年让你想投入进去再不出来……”

# 武术、围棋、唐密的三位一体

□林金荣